

# 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和合共生何以可能?

——以江苏为例

何 雨

**摘要:**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吸引着从经典到现代、从国外到国内多学科多领域理论家们的广泛关注。二者既变动不居又如影随形,相互缠绕交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意象之一和中国经济的重要版图之一,历史与现实的传承起合共同涵化江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性格;江苏地理区位、资源禀赋、重大事件等因素铸就了江苏文化求真务实、安土重迁、海纳百川、精致灵动、诚实守信的主要特征。经济是文化的化形,而文化是经济的本底。江苏文化孕育了江苏经济守正创新、制造为本、开放高地、有原无峰、平稳致远的基本特征。区域文化的渐变与区域经济的剧变之间存在迟滞效应,因此在发挥文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克服片面主义、急功近利倾向的危险,才能穿透时空迷雾,以文载道,达致文化与经济和合共生的理想愿景。

**关键词:** 文化与经济;江苏;迟滞效应;和合共生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0.03.005

## 一、文化之于经济:助力还是阻力?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始终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在于“能够制造工具”。但是,对贝尔(Daniel Bell)来说,人的更为本质属性是一种能够“制造符号”的动物。正是先有符号性“构想”,才能有后续的依托“构想”而诞生的具体“器物”。从“构想”形态到“器物”形态的转变过程,也是实践行为的转变过程。“构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进言之,作为“构想”指导下的后续行为,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反映,由文化所形塑。基于此,行为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关系开始浮现出来:文化是行为的自变量,而行为是文化的因变量。事实上,这仅仅是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个理想化勾勒,真实运行中的文化与经济关系要远复杂于此。贝尔指出:“一种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所有问题中最复杂的一个。”<sup>①</sup>波兰尼(Karl Polanyi)则指出“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体系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属于其他社会构件(social component)是一种普遍现象,“宗教和政府之于经济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货币制度或生产工具的创新”<sup>②</sup>。在此基础上,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发展出“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更为幽微地阐发

收稿日期:2020-0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特大城市老旧小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19BSH004)。

作者简介: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所副研究员(南京 210004; hzonghe@163.com)。

①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79页。

② 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或“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市场”的观念<sup>①</sup>。依托“嵌入性”概念，新经济社会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切入点。在其后发展中，借助于 Zelizer 等人的研究，作为社会构件之一的“文化嵌入性”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构成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源头<sup>②</sup>。

除嵌入性研究脉络外，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或经典的传统。面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何理解其成因？又该如何解释其发展进程或状态的区域差异？以及如何考察其表现形态与动力机制的变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这些重大经济问题或现象展开了文化分析。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诞生于西方，根源在于西方为之提供了文化源动力。始自于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对人们心灵的禁锢，从根本上重构了人神关系，也重构了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关系，让新的行为模式及其经济派生物成为可能。在宗教改革的诸多流派中，法国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在德国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因信称义”宗教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预定论”宗教观。在他看来，“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sup>③</sup>。以荣耀上帝为天职(calling)构成了弥漫于西欧的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的伦理基础，再加上禁欲主义文化传统，二者共同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性支撑：荣耀上帝的职业观满足了资本规训劳工的需要，而禁欲主义则顺应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当然，在此阶段，天职观与禁欲主义本身又融为一体：“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天职观为基础的理性生活样式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产生出来的。”<sup>④</sup>

对于韦伯来说，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天然亲和性的论断，并非一个仅仅局限于西欧范围内的有限经验或结论，相反，它还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验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韦伯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西方出现”的这一根本性追问，在后续研究中，他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其他地区出现”的对偶性追问，即，韦伯不仅要回答西欧地区之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助力”问题，还要回答非西欧地区之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问题，通过正反两方面对比性研究，才能寻找出更有说服力的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殊途的深层文化动力机制差异，并使之具有更为普遍性的跨文化解释力。围绕这一主题，韦伯先后完成三本宗教社会学著作，分别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和《古犹太教》。前两本著作重点阐释东方文明两大中心的中国和印度未能出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宗教/文化因素的原因，而第三本著作则试图通过追寻孕育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的文明原点，赓续古犹太教与新教之间的精神关联。

韦伯的研究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也激发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其中，关于中国的研究更是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在韦伯看来，儒教对世界采取的态度是适应而非改造，“儒教的传统主义取向始终固守着它的支配与统治地位，连同‘君子不器’的理想与‘重利轻义’的主张，使得中国经济无法朝向西方理性主义之途演进”<sup>⑤</sup>。与之形成印证的是，长期主导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支柱性政策——对内重农抑商、对外闭关锁国，也确实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产物。吊诡的是，实践与认知关系几乎走不出循环论证的困境，文化与经济关系也是如此。实践变化是观念变化的动力，但否定之否定的实践再变化，也会让认知经历否定之否定，进而让人们对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知回到原点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中国道路的高歌猛进，被视为与现代性水火不容的传统文化也在向人们呈现

①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pp.481-510.

②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pp.46-48.

③ 李春华:《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命题的现实意义》,《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④ 曾金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韦伯方法论的关联解读》,《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5期。

⑤ 刘雪飞:《试析马克斯·韦伯的儒学观》,《齐鲁学刊》2011年第6期。

出另一幅画面:非但没有像韦伯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反而在其自身丰富多元的传统中不断激发出接续、适应、涵化现代化的积极因素。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对十八世纪西欧与东亚、英格兰与江南发展路径差异的溯源性分析中指出,导致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根本动因,并非是韦伯式的文化内生型优势或市场与产权制度优势,而是在共同的生态与发展压力下东西方选择不同道路的结果:以江南为代表的东方选择了“内卷化”的发展之路,而以英格兰为代表的西方则选择了面向全球市场的海外殖民之路<sup>①</sup>。尽管彭慕兰的研究结论存在斟酌空间,但其拓展的迥异于韦伯的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动因分析本身就具有问题性价值。事实上,对于中华文化之于经济发展持有正向功能的国内学者也不乏其人:苏国勋指出,儒家思想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相反,儒家在仁爱精神上的推恩及人观、在信仰问题上的宽厚包容心态、在人际关系上的谦恭有礼等都是现代商业精神应有之义,能够中和、消解西方二元对立观下的各种紧张<sup>②</sup>。拉长时间线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侯杰明确指出,早在明清时期儒家的理念、精神就不再是空泛的道德教条,而是稳定商业秩序、保护正当利益的重要因素<sup>③</sup>。

## 二、江苏区域文化气质:果缘因成

探究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离不开对特点空间尺度范围内的文化样态有一个基本认知。从概念上说,区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群体意识、价值观念、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管理方法等非物质性因素的总和,对内具有共性、对外具有个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sup>④</sup>。在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江苏文化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意象。漫长岁月的传承赋予江苏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一般共性,更有区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关于江苏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擘绘出江苏文化的典型样态与主要特征。莫砺锋认为,江苏传统文化的成就全国领先,现代学术理念和学术风气优良<sup>⑤</sup>;徐耀新认为,江苏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为南秀北雄、吴楚分明,大致可分为“四主区”和“三亚区”<sup>⑥</sup>;胡阿祥、姚乐将江苏全省划分为四大文化区与八个文化亚区<sup>⑦</sup>;胡发贵认为,江苏人文精神最为显著的特征为谦和礼让、关注民生、先忧后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sup>⑧</sup>;赵明奇、李玉铭认为,江苏文化具有吴文化的“秀美”与汉文化的“雄豪”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质<sup>⑨</sup>。

总体看,研究者们主要是从类型学意义上阐释江苏文化,建立特定空间与亚文化类型的关联,但未能构建出一个整体性的江苏文化意象。在方法上,也以静态分析为主,基本上未能注意到形成江苏区域文化意象的过程与动因,换言之,没有回答形塑江苏文化意象的动力机制,特别是未能在大历史背景下,探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与文化气质的关系。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今日江苏文化的精神意象与地域性格是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与重大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时间的沉淀与发酵中逐渐定型化的。

1. 重商主义铸就江苏求真务实的文化气质。纵观封建社会发展史,重农抑商几乎是一条主线,然

① 李大伟:《历史比较研究与“欧洲中心论”之反思——以〈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为例》,《历史学的省思与展望——第三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2013年11月23日。

② 苏国勋:《重读〈儒教与道教〉》,《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

③ 侯杰:《明清时期的商人与儒家思想观念》,《南开学报》2000年第5期。

④ 李宗植:《发挥江苏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现代经济探讨》2003年第4期。

⑤ 莫砺锋:《中国文化传统与江苏文脉》,《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4期。

⑥ 徐耀新:《江苏地域文化述论》,《艺术百家》2017年第4期。

⑦ 胡阿祥、姚乐:《江苏文化分区及其影响因素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⑧ 胡发贵:《江苏人文精神的地域特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⑨ 赵明奇、李玉铭:《吴韵汉风:江苏南北特色文化的和合之道》,《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而,江苏却是一个例外。绵延不绝的重商主义始终是江苏经济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sup>①</sup>。原因在于:一是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为商业繁荣提供了经济或商品基础。虽然江苏总面积在全国省区中排名靠后,但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程度却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几乎是寸土寸金。此外,江苏还盛产大量关键性民生用品或物资,如,必不可少日用的食盐、面向中高端消费市场的丝绸,以及有闲阶层情有独钟的茶叶等。二是南迁政权带来的多元消费需求为商业繁荣提供了直接动力。定都江南,意味着全国消费中心的随之而来,全国各地海量物资的源源涌入。三是通江达海的水网优势为商业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在传统社会,道路基础设施落后低效是影响商贸往来的关键性因素。大宗货物无法高效运转,极大限制了商业贸易的壮大与繁荣,然而江苏却能够另辟蹊径。横贯东西的长江、纵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漫长的海岸线,再加上不可胜数的支流水运网络,让江苏不仅拥有跨区运转商品的物流大通道,而且还拥有几乎打通到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毛细血管。遍布全境的水上路网,不仅意味着运输成本低、效率高,还意味着风险小。与陆路相比,水上运输遭遇打家劫舍情况要少得多,大幅降低了潜在损耗。在1990年代前后,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江苏境内的公路养护状况要远远好于山东。其原因就在于江苏境内拥有京杭大运河、长江等水路干网,分流了公路上的大宗货物压力。绵延千年、遍布千里的河上商路,为区域重商主义提供了可能,也客观上铸就了江苏求真务实的文化气质,因为理性化程度与商业繁荣程度息息相关。

2. 繁华富庶铸就江苏安土重迁的文化气质。受益于辽阔的平原、勤劳的人民,在农耕文明中江苏几乎一直就是繁华富庶的代名词。自唐以降,以江苏为主体的东南地区,一直是封建政权财赋最重要的来源地。韩愈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宋史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且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在明朝,仅苏州府上缴的税赋就约占全国总税赋的十分之一强。到了清朝,更是有着“税赋甲天下”之说,江南省的税收钱粮占据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凡事有利必有弊。繁华富庶也养成了江苏人安土重迁的集体心理倾向。在人类社会发史中,“资源诅咒”几乎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即,艰苦条件让人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优渥条件反而让人麻醉,丧失进取心。如明清时期徽商之所以活跃于江南,就是源于皖南资源压力而被迫出走;今日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温州商人、宁波商人,同样源自资源贫瘠下的生存压力。平原水乡为主的地形地貌,意味着每一寸江苏土地都能提供高效的农林牧渔产出。此外,绵延数百公里的沿海滩涂又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民生物资——食盐产业的高度发展提供可能,使之成为支撑繁华江苏的重要商品之一。正是在此背景下,源自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农业研究的“内卷化”概念(involution),在黄宗智等人手中成为解释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关键性工具<sup>②</sup>。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必要前提就是区域土地资源能够满足“内卷化”的需要,即能够支持大量农业劳动力投入与精耕细作。只要没有特别大的天灾人祸,江苏大地就是一座天然的“米粮仓”,完全能够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而无需背井离乡寻求生存机会。

3. 衣冠南渡铸就江苏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质。华夏文明源于一域,但并非定于一域,在漫长的历史中,呈现出由中心到边缘、由北方到南方、由一族到多族的渐次扩散过程。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政统象征的王室的迁移始终是扩散的一个主线或标识。或是异族入侵,或是王室衰微,中原政权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京城而另觅栖身之地。令人讶异的是,原本处于边陲的荒蛮之地——江南,多次成为衣冠南渡的目的地与北方王权的避难所。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衣冠南渡事件就有司马睿于建康建立东晋、李昉于江宁建立南唐等。中原政权的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华夏文明的主流文化<sup>③</sup>。这些文化在改造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汲取所在地文化基因改造自身。在中原文化和当地文化的融合之外,另一个融合也在衣冠南渡后展开,那就是佛教与儒教、道教文化的融合。“南朝四百八十

① 钱智:《吴文化区域系统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③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域文化之分途异向演变述论》,《学海》2011年第4期。

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的诗句,既是赏景,亦是悼古,追忆佛教在江南的扎根与壮大。王室南迁与多重文化的交融、碰撞与沉淀,让江苏文化气质多了一份海纳百川的从容与淡定。

4.水乡泽国铸就江苏精致灵动的文化气质。江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文化大省,又是一个以水见长的沿海省份<sup>①</sup>。水是江苏文化的生态本底,而江苏文化也体现了水的性格。从地形地貌上看,江苏平原辽阔、湖泊众多、水网密布,是我国地表水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从结构上看,平原、水域、低山丘陵分别占据江苏全境的69%、17%和14%。其中,仅湖泊面积就达到了6853平方公里,占全境面积的6%,湖泊率位居全国第一。除拥有太湖和洪泽湖全国五大淡水湖中的两个之外,还拥有高邮湖、骆马湖、石臼湖、溮湖、邵伯湖、阳澄湖等一批全国知名湖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共有290多个,几乎覆盖江苏全境。在孔子看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老子看来,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与豪迈壮阔的北方文化相比,在水的浸润与洗礼下,精致灵动成为江苏文化的气质。文化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总会借助于各种形态表达出来。最能代表精致灵动文化物质形态的,莫过于园林。苏州园林甲天下,据统计仅现存园林就有50多处,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10多座。除此之外,扬州、淮安、南京等地的园林遗存同样极为丰富多彩,共同见证着江苏文化的精致灵动。

5.耕读传家铸就江苏诚实守信的文化气质。商业或金钱具有腐蚀性,会败坏人的品性,堕落人的行为,如,唯利是图、无商不奸几乎是商人群体的固有形象,融入人们的认知深处。按照理性人假定,利益最大化是支配商人行为模式的内驱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古今中外也有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故事在重复、强化这一刻板印象。对于江苏来说,如何避免商业繁荣所带来的伦理困扰?在喧嚣的尘世中如何寻求心灵的安宁?又该如何解决家族传承中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答案在于儒道释的交汇,以及中原文明与水乡文化的融合,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走出此岸繁华、迈向彼岸安宁的心灵之路,即以文化人。唯有诗书传家方能历久弥香,而丰饶的物产也为读书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构成了繁华江苏的另一面。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有传者大概在2万多人,其中6000多人为江苏籍;在118名清朝状元中,江苏籍高达49人。当然,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也存在着另一种逻辑,即,在传统社会,政商本一体,要想让生意做得大、做得长,需要官场有人,由之推动人们读书。或许,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动力会有不同的源头,但最终共同汇聚于江苏商业精神气质上。仁义礼智信的文化道统,与江苏区域商业文明的融合,共同铸就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底色。

### 三、江苏区域经济特色:文化于形

历史上的江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早在万历年间苏州丝织业部门就出现专业化的纺织工、纱工、锻工等工种,以日计酬,从业人员数以千计,与机户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特征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近现代以来,秉持重商主义传统的江苏,再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南通、苏州、无锡等地成为民族资本主义最大的发祥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图存中前赴后继,高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大旗。作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江苏大地的面貌,在率先发展的使命中为现代化中国之路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江苏样本。经济是文化的化形,文化是经济的本底。江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高地,相当程度上源自其也是中国文化高地,文化基因早就融入江苏血脉之中,也在江苏经济形态特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是求真务实孕育江苏守正创新的经济特色。继农转工、内转外之后,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第三次经济转型的主题主线,也成为江苏经济建设的重点与焦点。统计显示,在2009-2017年间江苏连续9年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一。2018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sup>①</sup> 王世谊:《水文化孕育的江苏精神》,《唯实》2005年第5期。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超过 43%，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研发经费投入为 2504.4 亿元，占全国比重为 12.72%，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2.7%，投入强度指标领跑同类省区（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仅次于广东的 2.78%）。全省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19.89 万人，从事研究与发展（R&D）人员 79.41 万人；全年累计专利申请量 600306 件，来自企业专利为 437601 件，发明专利为 198801 件；专利授权量为 306996 件，来自企业专利为 236629 件，发明专利为 42019 件；全省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02 人，位居全国前列，仅次于北京、上海。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江苏经济最为靓丽的一张名片，与此同时，江苏的创新之路始终带有深厚的法理底线与伦理关怀，没有陷入创新拜物教的疯狂之中，是一种有底线的守正式创新。我们知道，创新需要打破窠臼，经常游走在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这往往会导致一些利用各种监管真空与伦理空白。如，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互联网经济，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给诸多群体留下了痛彻心扉的伤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互联网金融，有些组织打着创新的名义干着违法诈骗的勾当。面对着互联网经济的致命诱惑，尽管或多或少受到冲击，但是江苏并没有晕眩，相反，始终对互联网新经济保持一份清醒与警惕。基于守正基础上的创新，从根源上讲，来自求真务实的文化传统。贵真贵实忌浮夸，才让江苏在创新驱动上不盲目不冲动，坚持技术为本、实业为基。

二是安土重迁孕育江苏制造为本的经济特色。产业结构大多会经历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演进过程。在总体上遵循这一规律的同时，江苏经济现代化也呈现出自身特色。1952 年农业增加值占江苏全省 GDP 总量的一半以上。<sup>①</sup> 1972 年第二产业首次超过农业，三次产业结构由“一二三”转变为“二一三”。1989 年第三产业首次超过农业，三次产业结构转变为“二三一”。2005 年第二产业占比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点。2015 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全省最大的产业部门，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的转变。然而，从 2016 年开始，二、三次产业间快速消长势头趋于停滞，第二产业开始稳定在 45% 左右，而第三产业则基本维持在略高于 50% 的状态。第二产业的重新复苏，除源自人们的认知不断深化、逐渐走出服务业至上的迷思外，也与江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中，从空间关系上看，商业业态主要有两种，分别为行商和坐商。行商，主要是走街串巷、无固定场所的流动经营模式；坐商，则是被锁定在特定空间上的经营模式。行商的优势在于，机动灵活，与消费者直接对接；但劣势在于，缺乏稳定性、持续性。与之相比，坐商的优势在于安土重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附着于特定空间之上，既是一种锁定，也是一种承诺，即，要对产品负责，否则消费者随时能够找上门；反之，一旦做出口碑就可以生生不息，世代传承，成为百年老字号。以制造业为主的江苏经济是千余年来安土重迁坐商传统的延续，也是对自身产品质量至上信念的延续。

三是海纳百川孕育江苏开放高地的经济特色。站在当前，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选择。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休戚与共的必然要求。正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形成了江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经济格局。统计显示，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由 2008 年的 3922.68 亿美元跃升到 2018 年的 6640.43 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期初的 2380.36 亿美元增长到 4040.44 亿美元；进口总额从 1542.3 亿美元增长到 2599.99 亿美元。从全国占比看，2008—2018 年江苏对外贸易份额始终维持在全国 15% 左右的高位水平。更为难得的是，从 2000 年起外贸出口额连续 19 年位居全国第二位。累计使用外资占比超过 1/5；服务外包总量占全国三成，离岸执行额连续 9 年居全国第一。今天的开放高地在相当程度上是过去海纳百川式开放传统的继续与必然。改革之初，面对百业待兴的格局，江苏近乎本能地发现开放的巨大机遇：昆山以敢为天下先的果敢，在全国范围内自费兴建第一个开发区，吸引台资台商；苏州工业园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引进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经验与模式，全力打造中外合作的园区样板；等等。

四是精致灵动孕育江苏有原无峰的经济特色。相对于广东、浙江、山东等省份来说，“高原”式均

<sup>①</sup> 直至 1952 年，作为当代省级行政单元的“江苏”，才在江北行署、江南行署与南京直辖市的基础上合并而成，并经历了多次跨省的区划调整，故，关于江苏全省层面的统计数据，大多始于 1952 年。

衡是江苏主要特色之一,在经济社会民生等主要方面,几乎没有明显短板。但与此同时,缺少“高峰”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从企业层面看,在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江苏共有83家上榜,仅次于浙江的91家,远高于广东的57家。然而,从巨头看,广东有华为、腾讯、华大、大疆,浙江有阿里等一批超级行业标杆企业,而江苏几乎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在全国有引领性、号召力的类似企业。从城市层面看,江苏优势在于有深度,2019年13个地级市经济总量全部超过3000亿,相当于广东、山东等省份中等偏上地级市的经济体量;广东优势在于有高度,坐拥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与之相比,作为江苏最强地级市的苏州差距明显。从根源上看,精致灵动是有原无峰的文化诱因。这一文化容易培养出工匠精神,聚焦于质量,对产品精益求精,如江苏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的隐形冠军。然而,过于关注于细节,执着于产品,在相当程度上要以眼界与格局为代价。此外,精致灵动也容易让人小富即安,总体上呈现出风险厌恶型取向,在创新创业道路上的雄心略有不足。

五是诚实守信孕育江苏平稳致远的经济特色。运行平稳、稳中有进是江苏经济的显著特色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无论是外部冲击,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债危机,还是内部调结构、促转型政策上的波动,基本上没有改变江苏经济长期向上向好的态势。间有回落,也能很快重返正轨。期间,先后有两次经济增速低于10%,分别为1989—1991年和2013年至今。前者主要是严峻内外部冲击的结果,而后者则是主动转型的结果,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自觉选择。但即使处于回落周期,区域经济增长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后,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江苏是仅有的误差在1%以内的省份,且为向上修正,与部分省市大幅向下修正GDP数据形成鲜明对比。数据质量是统计水平的反映,更是文化基因的体现。诚实守信的文化基因构成江苏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 四、结论与讨论:和合共生何以可能?

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等人指出,经济嵌入于社会之中,离不开文化系统的支持。韦伯更是在探究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上指出文化是经济的原动力,构建了文化模式与经济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特定文化模式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促进(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或阻碍(儒家、道教、印度教等东方文化,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用。美国社会学家W. F. 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也曾提出一个著名概念——“文化堕距”(culture lag)<sup>①</sup>,指出,在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变迁速度并非一致,物质与技术的变迁速度,往往要快于制度与观念的变迁速度。这种延迟就是所谓的“文化堕距”,其实质是物质的剧变与文化的渐变之间的脱节,并由脱节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转的失序。这是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妥善处理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个基点。奥格本问题也是对韦伯经典命题的挑战,并引发一个悖论,即在文化变迁的速度总是要慢于经济变迁的速度的前提下,又该如何发挥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以文化来引领经济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又该如何实现?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中逐渐成为一个地域或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心智,并外化为行为模式。这一特性意味着人们在看待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问题时,或许应该超越对应性、匹配性思维,不能过于急躁地用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要求文化发展的速度。事实上,如果一个地域或民族共同体文化基本要素,总是处于快速变动重构中,不仅不能引领经济发展,还会造成人们思维混乱、无所适从,引发各种各样的心理失调、行为失范。当理解这一点,在处置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上,也就有了答案。从一般性角度上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让文化跟上经济的脚步,而是要让经济尊重、涵化文化的约定俗成。因为它们是地域或民族共同体集体选择的结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在实践中体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如,在对待儒家文化问题上,人们正在经历认识上的反转:从韦伯式的阻碍否定论到后来

<sup>①</sup> 转引自黄杰:《文化堕距视角中的江湖文化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者们的融合肯定论。认识新变化并非源自儒家文化自身发生改变,而是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生动活泼的时代实践倒逼人们的思想观念要与时俱进。期间,儒家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发生了化学反应,陌生的隔膜被打通、误解变理解,如人们在仁义礼智信与现代契约精神之间寻找到大量交集,形成最大公约数。诚信,本就是现代契约精神的本质要求;正确的义利观,则是在接续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智与仁,又丰富了现代企业家精神,要有勇有谋,还要遵循社会公德,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等。

对于江苏来说,构建良性文化与经济关系,消除高质量发展中的消极文化因素,壮大积极文化因素,是必然要面临的议题。但在处理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上,必须坚决抵制片面主义、急功近利的诱惑。制度创制、政策设计、体制机制优化等措施,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人们既不能在短时间内创制出新的文化,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旧的文化。在文化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我们付出过巨大代价、遭遇过惨痛教训:或是极为野蛮、粗暴地铲除落后的封建文化、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试图斩断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割裂全球化时代中的外来文化;或是盲目乐观、一厢情愿地拥抱革命浪漫主义文化。代价是高昂的,教训是惨痛的。大动干戈后的理想文化样态,并没有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反而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几乎崩溃的悬崖。以史为鉴,应该充分认识到,以文化高质量引领经济高质量,犹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既不能粗暴移植,又不能简单嫁接,而要以挖掘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主,寻找文化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作为连接两者的纽带与桥梁,最终推动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和合共生。

除要充分体会和认识到文化的累积性、穿透性、延续性外,还应注意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并非是刚性的、直接的,而是柔性的、间接的,主要是借助于心智养成、情感培育涵化人们的行为模式,再借助于行为模式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例,首要前提就是人们要形成这样的认知与观念,而这急不得、快不得,只能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与熏陶来达致。此外,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或者应该避免的倾向,就是要放弃把文化当作万能处方的错觉。文化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基石、价值导向、精神动力、行为模式等,但绝不是万能的。一旦泛化文化作用,只会把文化庸俗化、浅薄化。

基于此,以文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应该侧重于为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模式提供一个心智与情感上的“道”,即文以载道。只有构建认知图式中的正“道”,才能有行为模式中的正道,才能顺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于江苏来说,应该站在“道”的层面上,发挥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作用,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正确看待创新与守正的关系。在后发追赶型现代化道路上,面对新一轮全球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创新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欲速则不达。在创新之路上,剑走偏锋是一条捷径,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这里的“根基”,既包括自身的技术积累、人才储备、创新路径等,也包括创新的法理底线与伦理约束。创新,不能以牺牲法治、破坏伦理、挑战公意为前提。客观地说,创新道路的重大成就不容否认,但创新的理念与生态依然脆弱。例如,知识产权意识匮乏下出现的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简单复制、移植;基因工程上的某些创新,突破人类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底线;以模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新经济,更多是在利用监管软弱或真空来攫取法治红利、道德红利;等等。创新诚可贵,守正价更高。在守正基础上创新,才能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与持久性。这也是发达国家新一轮科技创新的主流:既要注意到创新的可能收益,又要警惕创新潜在的意外后果,并提前准备防控风险。江苏科技基础雄厚、人才储备丰富,在创新驱动道路上,始终把合法合规合公意的守正作为前提。面对大规模高强度新一轮创新驱动战略压力,继续传承弘扬这一宝贵经验、优良传统尤为重要。

二是妥善处理外来与本来的关系。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就其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在开放包容中才能不断迈上新台阶、拓展新境界。一千多年来,江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中心与文化高地,之所以能够在救亡图存危急关头勇立潮头,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间重新谱写



时代新华章,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心态,在不泥古不媚外的同时,择其善者而从之,涵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己之所用。过去经历也启示我们,单一向度的文化不足以支撑复杂现代化事业需要,甚至会让现代化之路面临山穷水尽之困。否弃本来,会让我们成为无根浮萍,只能随波逐流;拒绝外来,会让我们心胸狭隘、鼠目寸光,成为现代文明异类。以高质量发展为新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三统”关系:本土的文化道统、外来的现代西统及红色的革命政统。“三统”关系涉及两大转换:时间上的“古今转换”,即推动优秀传统要素在现代化中焕发新的生机;空间上的“外中转换”,即推动发达国家的优秀成果要素实现本土化。当前,“三统”之间的边界与壁垒还比较森严,彼此的矛盾与齟齬还比较多,非此即彼的痕迹还比较重。只有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又“自成一体、各美其美”的时候,如同儒道释三教关系从剑拔弩张到美美与共的时候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算彻底打通任督二脉,成为一个逻辑自洽、实践通融的人类共同体新方案。肩负“继续为全国探路”的江苏,要想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作出贡献,就要不断深化对本来、外来关系的认识,寻求“三统”融合、两大转换的江苏路径。

三是辩证认识区域文化因素的优势与劣势。区域文化是区域共同体的集体心智与情感表达,具有鲜明的个性,而个性犹如硬币,总有正反面。区域文化的个性因素在成就区域经济的同时也限制区域经济。“有原无峰”是江苏经济的显著特点,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也成为区域政策发力焦点,试图实现从“有原无峰”到“有原有峰”的转变。愿景值得肯定,努力值得赞赏。然而,“有原无峰”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是江苏精益求精、诚实守信的结果,是守法合规的结果,是稳健经营的结果。近年来,一大批曾经风光无限的所谓独角兽企业,在潮水退去之后纷纷显出原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量独角兽企业依靠激进投资、高杠杆投资、博傻式投资走到时代前台与镁光灯下,主要是靠攫取货币宽松与监管宽松红利。一旦货币收紧或监管从严,提高合法合规的要求与门槛,那么相关企业就不得不面临釜底抽薪、墙倒人推的结局。所谓“剩者为王”的互联网超级巨头,大多也是“幸存者法则”下的少数幸运儿,或是在攫取完货币宽松与监管宽松红利之后及时收手转型,或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时代精神与氛围的变化,意味着激进化的创新创业之路已经不再具有可模仿可复制可推广的意义。故,应该以平常心来看江苏“有原无峰”状态。要放平心态,可以积极向高峰准备、出发甚至冲刺,但不要急于一时,而是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态度静待花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之道,经世之要。区域竞合是一场马拉松比赛,要有长跑的心理准备。对于兄弟省区的先进经验,可以镜鉴,但没有必要过度模仿,否则,很容易东施效颦、南橘北枳,不仅没有学到别人长处,反而丢了自己特色,变得不伦不类。从国际经验看,美国与德国可以作为这一类型学意义上的参照范本:前者“有原有峰”,而后者更多的是“有原”。以制造业为主、实体经济见长的江苏,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积极镜鉴吸收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与道路是更为贴切理性的选择。

四是努力引导区域文化在分合异同去取中良性消长。继秦王朝郡县制后,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中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区域行政体制变动就是元朝的行省制。行省制的一大特色在于,并非以语言、文化、习俗、自然地貌作为依据,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构建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经贸联系高度同质性的省级空间单位,而是刻意打造一个行政、经济、文化与军事异质性极大的区域作为省级空间单元。自然区、经济区、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四区异构”,必然会导致空间单元内的亚文化族群之间相互牵制,从而解决“四区同构”行政单元潜在的地方割据、尾大不掉问题,以强化中央集权。客观地说,自元以降,行省制安排确实极为有效地避免了困扰中华帝国千年之久的统一与分裂的循环问题。尽管其后省级行政单元的具体边界与范围变动不停,但行省制的精神内核基本未变。今日江苏现状也是行省制理念的典型体现,以文化区为例,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江苏几乎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系列亚文化形态区,包括以宁镇为主的金陵文化区、苏锡常为主的吴文化区、扬泰为主的维扬文化区、

徐淮宿为主的楚汉文化区以及连盐通为主的海洋文化区<sup>①</sup>。文化区上的自成一体、各具特色,也是自然区、经济区、行政区上断裂与紧张的体现,如从地理区位上看,经济中心位于全省东南一隅,而行政中心位于西南一隅。对于江苏来说,省级行政区意义上的文化政策,应在尊重次区域差异基础上,努力寻求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分中求合、异中求同,逐渐形成一个与行政区同构的文化区。同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合理引导、改造次区域中与现代商业文明有龃龉的落后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性文化驱动力。

五是积极推动区域文化由耕读传家向商读传家转变。经济高地与文化高地的相辅相成是千余年来江苏最为鲜明的地域标识,二者互为表里、唇齿相依。时至今日,江苏经济依然散发出强烈的儒雅气质,无论是在企业家精神层面,还是在有形产品层面,基本上都鲜有过于飞扬跋扈的壮志雄心,而多了一份从容淡定的执着与坚守。路漫漫其修远兮,江苏上下而求索。不以路远易其志,不以喧嚣惑其心。在传统社会、自然经济下,传承江苏文化香火的是耕读传家,也让江苏成为千山千水千秀才的儒家重镇。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农耕经济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代之而来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经济表现形态可以变换,但以书育人、读书传家、书香门第传统不能变换,能够变换的就是要适应新时代,从耕读传家转变为商读传家。商读传家的意义在于,不仅能为个体的家族提供具有时空穿透性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能够为纸迷金醉时代中的集体浮躁或喧嚣提供熨平情绪的知识良方,让人们不致过于迷失在物质的欲望世界中,而能够多一份信仰,多一份释然,多一份超脱。

---

## Possibilities for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nomy to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 an Example of Jiangsu Province

He Yu

(Institute of Social Policy,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4, P.R.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a fascinating topic, attracting wide attentions of theorists from classic to modern, from abroad to domestic. Both of them are changing and following each other, intertwined and interwoven. As one of important imag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as of China's economy, the inheritances and combination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have cultivated the characters of Jiangsu's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nomy.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su's culture with pragmatic spirit, nostalgic provincialism, inclusiveness, skillful manufacture and trustworthiness are the result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resource endowments, major events and so on. Economy is the form of culture, while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y.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su's economy with conservative innovation, manufacturing-oriented, open highland, plateau without peak and steady distance are the reflections of regional culture. There is a lag effect between the gradual changes of culture and the drastic changes of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overcome the dangers of unilateralism and the tendency of 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 so as to penetrate the vis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achieve the ideal states of culture and economic harmoniously.

**Keywords:**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nomy; Jiangsu province; Lag effect; Coexist harmoniously

[责任编辑:郝云飞]

---

① 胡阿祥、姚乐:《江苏文化分区及其影响因素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